

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职业教育 培养高技术人才的定位、困境及路径

余以勒

(浙江工业大学, 杭州, 10337, 中国)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在数字化时代, 劳动力指向型产业受到极大冲击, 市场对产业工人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职业教育系统作为培养产业工人的最大主体, 如何应对以颠覆性技术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对未来人才市场需求的挑战, 关乎职业教育的存续和发展。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 生产一线岗位的技术技能需求日益提高与职业院校旧有人才培养模式无法补齐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缺口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 职业教育与新技术融合发展的矛盾、职业教育与产业技术快速迭代的矛盾、职业教育内部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为此, 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提高教师数字化素养以实现新技术效能转化; 纳入“编外教材”作为教材改革的补充以填平产教信息差; 在坚持政府监管下引入市场手段以打破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侧改革的结构性桎梏。在当前这个高等教育发展较中国产业高速升级相对迟滞的时代, 职业教育应以开放大胆的姿态, 刷新人才培养模式, 快攻快打, 迅速抢占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应用人才市场新的生态位。交出一份彰显职业教育是平行于普通教育的“类型教育”, 而非其下位替代的时代答卷。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er.v1i1.299>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从 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 从今年 1 月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作出系统阐述到 3 月在全国两会上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已然从一个抽象概念变化为一个被诉诸现实意义的指导思想。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通过颠覆性技术的应用,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

作者简介: 余以勒 (2005.04), 男, 汉族, 浙江台州人, 本科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大学制度。

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1]。在新质生产力中，颠覆性技术的实例包括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这些技术通过突破现有技术轨道，转向新的技术路径，以革命性的方式改变经济发展的形态^[2]。颠覆性技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生产的技术路径、产业模式，产生新业态、创造新产品、引发新需求，淘汰旧产品或服务，改变现有市场格局，驱动生产力向新的能级跃升。具体来说，许多颠覆性技术的产生与发展都源自基础研究领域的突破，能在性能、成本、环境友好等方面大幅超越现有技术，实现开辟新赛道、新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些技术的应用场景具有多样性、规模性、演进性、协同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在其“工程化—商业化—产业化”的动态演进过程中，加速了颠覆性创新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过程^[3]。

（二）研究目标

本研究旨在通过三个递进维度构建系统性研究框架：首先解析职业教育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破局者”“技能型社会突破口”“教育内卷调节器”的三重历史使命，明确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战略定位；其次系统揭示职业教育在技术融合过程中“学科中心主义制约技术转化”、产业适配层面“教材更新周期与技术迭代速率失衡”、制度结构中“政绩考核机制阻碍长周期改革”等矛盾的机理；最终提出“编外教材动态供给”“长协机制 2.0 校企合作”“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等路径，在缩短产教信息差、突破结构性桎梏方面的实践有效性，为职业教育适应性改革提供理论支撑。

（三）数据来源声明

本文不涉及隐私的数据，所有数据以及论述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库，如 web of science，CNKI 等。有关引证均标注引用来源。

二、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历史站位

要理解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职业教育的站位，不妨从“内卷”一词谈起。“内卷”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词，作为一个舶来词，其原意为农业发展到某一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经济现象，如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传统农业。但在中文语境和时代变迁的演进中，其含义变得泛在，被广泛运用在各个领域。如果以孤立的眼光看待内卷，可以举出诸如教育、就业、商业、社会治理等领域内卷的例子，但是以辩证统一的视角看待，产业经济的内卷是贯穿多领域的一条脉络。职业教育横跨职业域、技术域、教育域与社会域，是一种典型的跨界融合型教育，是多领域矛盾的交汇处，其被赋予了多元且复杂的使命，处在新质生产力时代的交叉路口，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破局者、“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突破口、“教育内卷”的调节器。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破局者

自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传统经济增长极减少，以廉价劳动力为驱动的低附加值产业发展放缓，这意味着低技能就业人群的就业环境将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尽管新兴增长极已经出现，但由于这些新兴行业的技术密集型和人才指向性极高，大量在陈旧人才培养模式下产出的人才无法胜任这些新岗位，出现了大量高学历人才在就业市场“下沉”的现象，也就是人们承诺常说的“本科干大专的活；硕士干本科的活”。这一现象既会倒逼个人在教育经历选择时盲目延长教育年限以躲避失业危机和缓解学历焦虑，又降低了民众高等教育的投入产出比，进而降低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经济学界将这种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的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竞争力，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进而诱发经济发展过程中累积的各种矛盾在中等收入阶段凸显出来（如产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的现象称作“中等收入陷阱”^{[4][5]}。学者们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的转型升级首先体现在劳动者的素质提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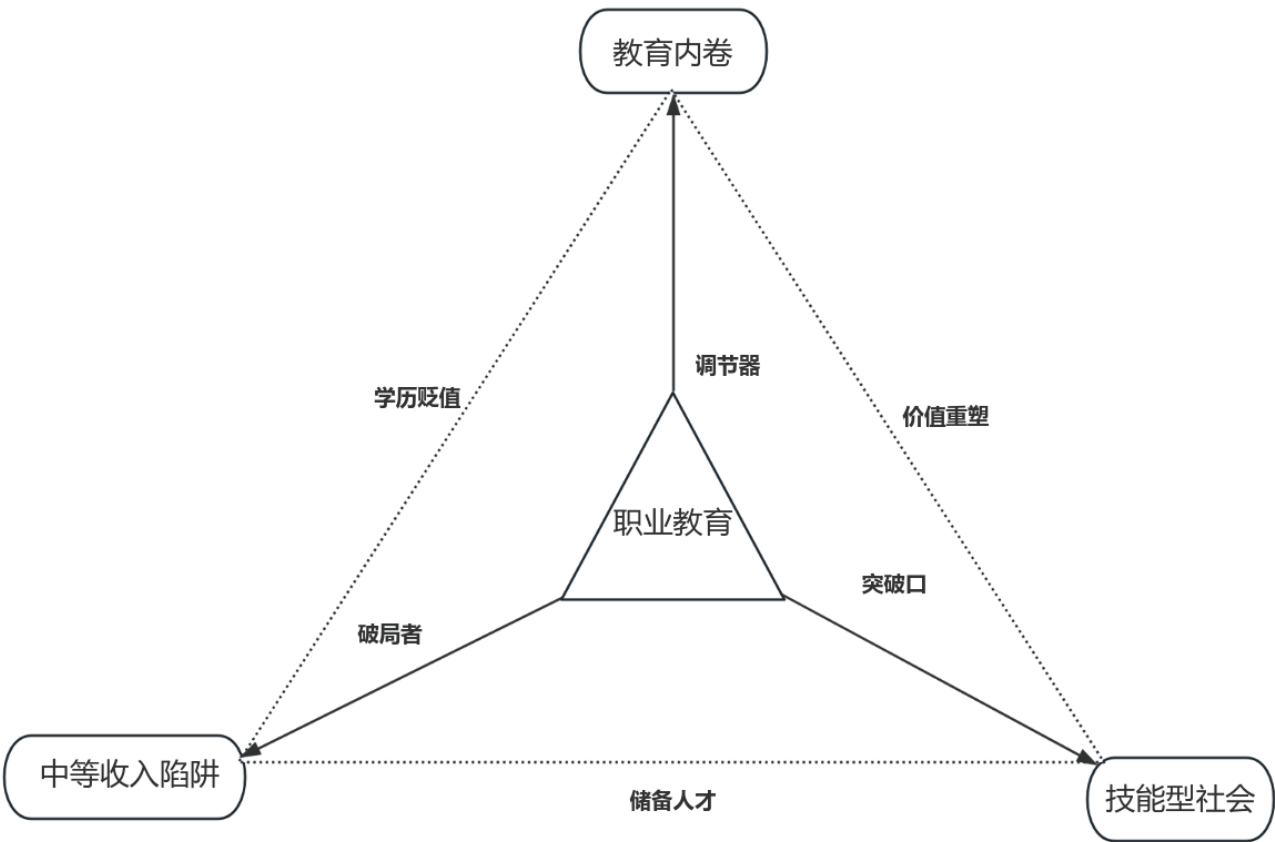
通过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养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加速经济的转型进程^[6]。

（二）“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突破口

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近十年最重要改革的一部分。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主要是对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这三个要素的供给实现的。这三个要素在过去是拉动中国经济腾飞的“三驾马车”，但过去三十年，这“三驾马车”开始减速，中国经济指标的联动性开始出现背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旨在通过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自 2015 年以来，供给侧改革成为中国经济领域的热词，其核心在于解决长期存在的供需不协调问题，即无效供给与供给缺口并存的问题^[7]。职业教育位于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侧”一端，当其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端”紧密对接时，每年庞大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供应将迅速填补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工业人才缺口，加快人才定向流动，而非大量下沉到低端就业市场。一旦新兴工业规模化，在当地形成产业集群（通常以高科技产业园区的形式），可以消化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减少低技能就业弱势群体的生存压力。周边必然兴起一系列配套。这些提供配套产品及服务的企业和个体户代表着大量就业岗位和消费，为当地的就业和税收提供稳定的保障。庞大的一线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群体及职业教育稳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供应也将为海外投资提供信心，促进国内外双循环。大量的人才需求，不菲的薪资和高技术产业工人群体的自我认同是营造“技能型社会”氛围的关键，是“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突破口。

（三）“教育内卷”的调节器

在教育领域，内卷化表现为教育资源的过度竞争和无效消耗，导致教育目的异化和教育质量的下降^{[8][9]}。可以预见的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将不断强化，但不能视而不见的是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天然具



图一：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历史站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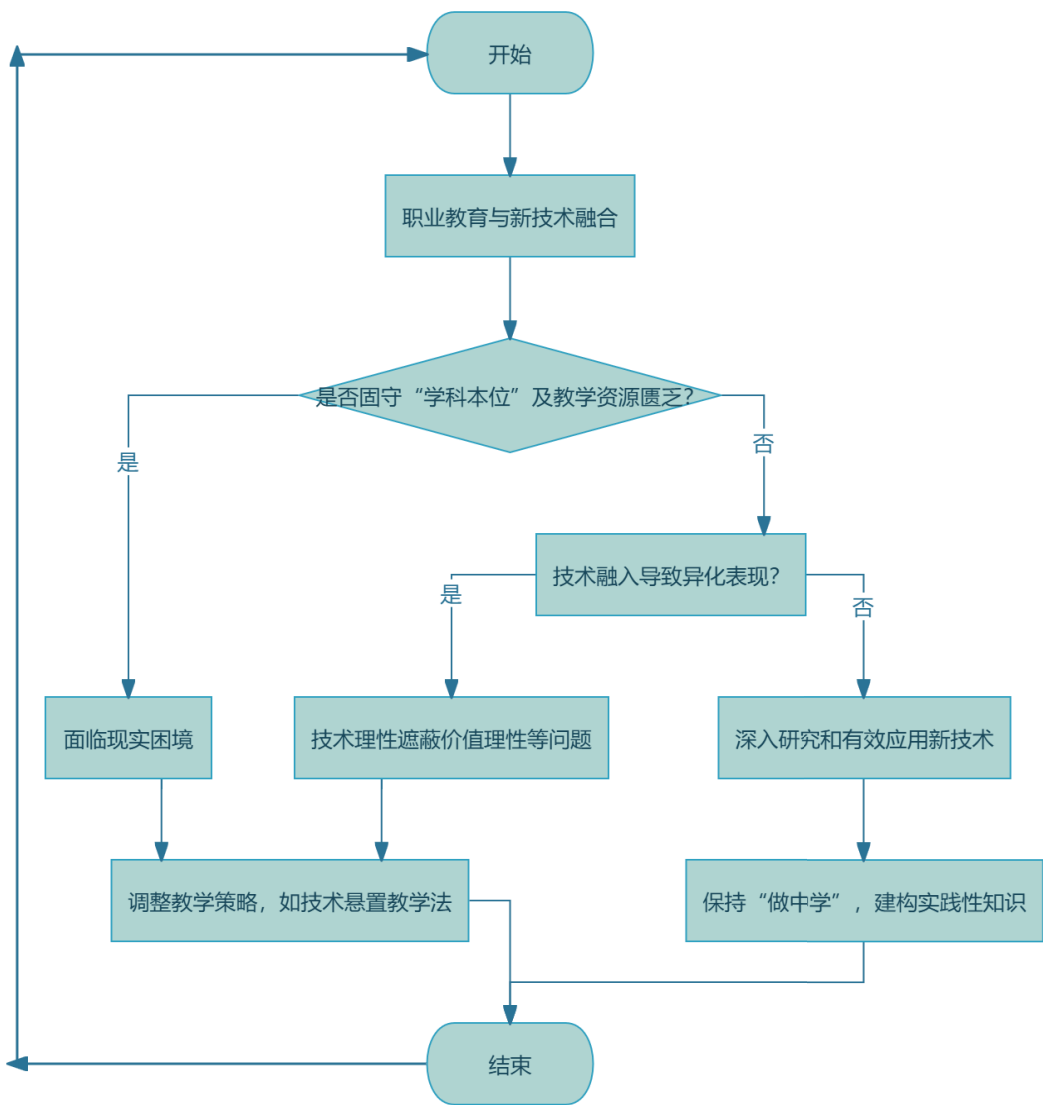
有稀缺性,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基本属性不会发生质变。因此,开辟一条新的优质的职业教育升学赛道,是对冲“教育内卷”的有效手段。尽管国家大力推行“双减”政策,扩大高等教育投入,强调职业教育是平行于普通教育的“类型教育”,但文凭主义思潮仍统治高等教育界^[10]。有学者将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研究人们对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选择。研究发现人们越重视教育就越愿意选择普通教育。职业教育要实现从等级分层到等位分类的转变,必须提升教育质量,同时要突出其功能特色和价值,并且需要加大宣传力度,以引导人们基于教育价值的需求做出理性的选择^[11]。要理解广大人民群众普遍选择普通教育的原因,因此切实提高职业教育学生的获得感和成就感至关重要,只有职业教育在升学和就业市场中实现投入产出比的全面优化,才能改变职业教育长期在大众心中的刻板印象,提高全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打造平行于普通教育的“类型教育”。这种认可不仅能为职业教育带来大量优质生源,而且分离了部分普通教育的人流,从根本上缓解了“教育内卷”。

三、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困境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靠颠覆性技术及其配套生产资料的有机融合。数字化技术,诸如 IPV6、工业互联网以及区块链,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以这些技术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为例,它们带来了深远且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变革系统性地重塑了职业教育的存在形态、体系结构、运行机理、育人模式和治理方式,从而彻底改变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常态和既定范式^[12]。同理,每个特定行业迸发的新质生产力必然从各个方面渗透并影响职业教育的教学范式,如果不能合理地接纳这些行业之变,产教融合的脚步必然受阻。由于职业教育特殊的职业、教育、社会三重密集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下产业技术的快速迭代这一基本属性相碰撞,生发出三对矛盾:职业教育与新技术融合发展的矛盾;职业教育与产业技术快速迭代的矛盾;职业教育内部的结构性矛盾。

(一) 职业教育与新技术融合发展的矛盾

随着新兴技术革命时代的到来,职业教育与新技术的融合发展成为必然趋势。然而,当前职业教育在新技术融合过程中存在固守“学科本位”、教学资源匮乏、囿于传统教学等现实困境^[13]。在职业教育中,技术的融入往往导致技术理性遮蔽了价值理性,技术主导性取代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技术导向的教学破坏了原有的教育生态,而技术的预设性冲击了课堂的自然生成性。这些现象是职业教育技术融入过程中出现的异化表现^[14]。这些问题的存在,进一步揭示了职业教育在融合新技术时坚持“学科中心主义”的局限性。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的科研定位模糊,存在盲目模仿等问题,导致其陷入“学术漂移”的困境,这阻碍了职业教育的持续发展^[15]。这种学术上的“学科中心主义”态度,限制了职业教育对新技术的深入研究和有效应用。杜威的“经验连续性”理论为理解职业教育技术融合提供了动态调适的解释框架,强调技术系统与教育规律间存在渐进式适配过程。从“经验连续性”理论指出,智能教学平台等数字工具在提升实训效率的同时,其程序化特性可能减缓连续性经验建构,这种现象在数控编程虚拟仿真实训中尤为显著。学生虽能快速掌握标准化操作流程,却易因系统预设的完美工况模型而丧失故障诊断的反思空间。这种矛盾本质上是技术中介与职业能力生成规律间的阶段性磨合。技术采纳初期量化评估系统可能压缩试错反思的容错区间,但通过教学设计者的实践和调整,可逐步开发出嵌入缺陷模型的“技术悬置”教学法,引导学生在 AR 指导手册的分层提示中实现零件识别向电路原理诊断的能力跃迁;最终借助学习分析技术与电子学档的动态记录,使碎片化技能训练重构为连贯的职业能力图谱。这一过程印证了杜威将教育技术视为“中介物”的核心主张,揭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需在保持“做中学”经验特质的同时,使数字技术成为师生共同建构实践性知识的意义载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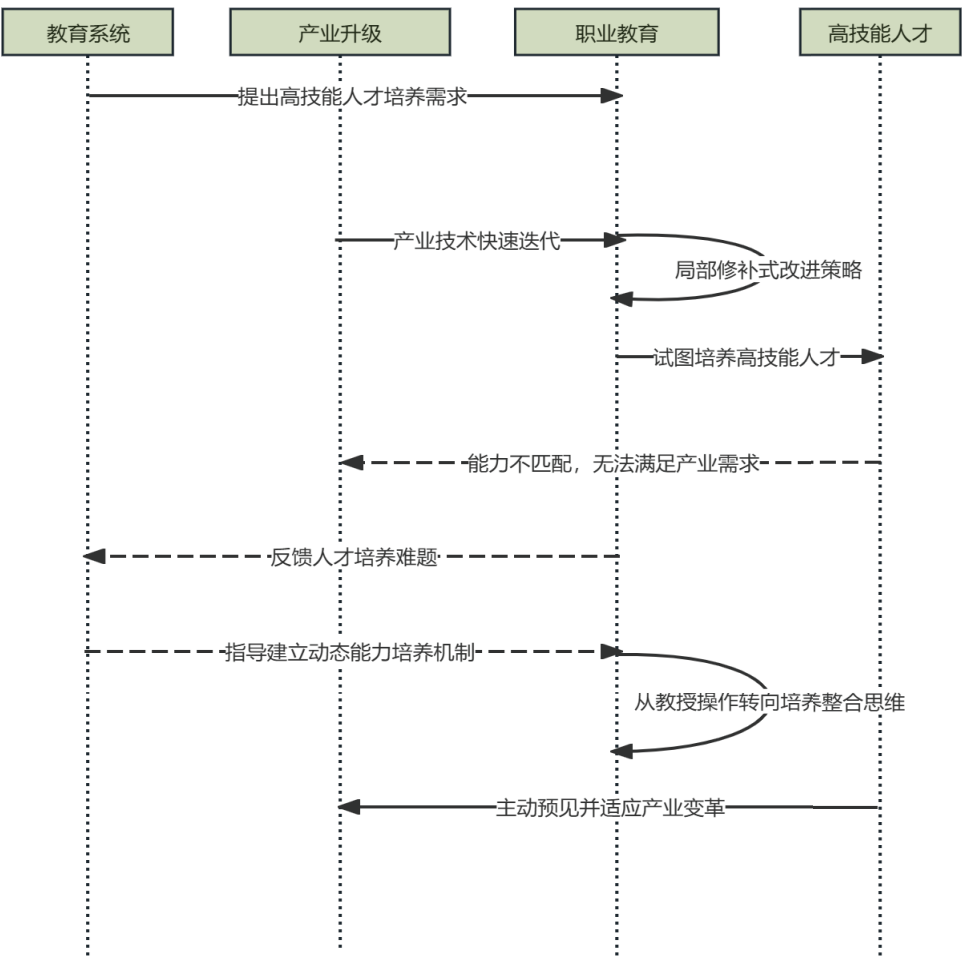


图二：职业教育与新技术融合发展的矛盾流程图

（二）职业教育与产业快速迭代的矛盾

颠覆性技术带来的新质生产力隐喻着生产关系的变革。随着“工业 4.0”和“中国制造 2025”等战略的实施，产业技术正在经历快速迭代，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6]。产业转型升级对高技能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当前职业教育在课程建设、师资素质、基地建设等方面存在不足，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不匹配。这种不匹配导致职业教育难以培养出符合产业需求的高技能人才^[17]。同时，在广域范围看，职业教育与产业界尚未建立起系统的协同创新的联动机制，无法做到快速响应产业界的变化^[18]。组织学习理论为理解职业教育与产业技术迭代的匹配难题提供了重要视角。职业教育在应对技术变革时，通常采用局部修补式的改进策略，比如针对新设备增设短期培训模块。这种应对方式看似解决了眼前问题，却未能触及产业升级对职业能力体系的重构要求，本质上仍停留在被动跟随技术参数的层面。当产业技术突破引发岗位能力体系转型时，职业教育需要突破传统的知识传授框架，转而建立动态能力培养机制。例如，从单纯教授设备操作转向培养系统整合思维，这种转变意味着教育理念的根本革新。更深层次来看，职业教育系统需要构建持续感知产业变革的预警机制，形成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使人才培养模式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预见。这种由表及里的认知转变过程，揭示了教育系统在追赶技术

迭代过程中遭遇的多重挑战，包括既有模式的惯性束缚、能力重构的认知阻力以及制度创新的现实难度。



图三：职业教育与产业快速迭代的矛盾时序图

（三）职业教育内部的结构性矛盾

历史不是一张白纸，后人只是在前人的墨迹后继续书写。肇始于 1917 年的中国职业教育学，完成了从翻译照搬西方“经学”到呈“译介与中国化”双重特质，再到创生具有本土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19]。中国职业教育在曲折中完成了本土化改造，形成了独特的职业教育结构，同时，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结构性缺陷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管理体制不完善、经费投入不足、评价机制不完善以及产教融合的配套机制不够完善等方面。在法律方面，我国现行的《职业教育法》自颁布实施已满 25 年。相较于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职业教育的法律体系发展明显滞后，亟需与时俱进，持续进行完善。在管理体制方面，职业教育管理体制面临多重挑战，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和培训中心归属不一，立法进程相对缓慢，这导致了管理体制的不顺畅^[20]。而且职业教育作为独立类型的教育地位尚未得到普遍认同，管理体制的障碍、跨部门政策的配套、衔接与协调不充分等问题，同样对职业教育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在评价机制及产教融合方面，校政企之间缺乏制度化的校企合作双赢机制和有效的监督评估机制。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缺乏积极性^[21]。职教集团化办学模式内部治理机制存在组织设计、规则制定和制度体系等方面的缺陷，多方不同的利益诉求及调控机制的缺位造成职教集团内部的掣肘^[22]。职业教育对市场有很强的指向性，表面上受市场逻辑制约，但职教集团本体实质上遵守政府逻辑。市场逻辑强调效率和自由竞争，认为市场能够通过供需关系自动调节资源配置，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政府逻辑则侧重于通过制定和执行政策来调节市场行为，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公共

利益,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灵活和稳定这两个关键词往往是矛盾的,从政府逻辑思考,当前中国最先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几大头部城市及地区。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进行重塑是一项投入、风险、收益巨大的系统工程,其耗费巨大,周期相对较长,这意味着这项工程无法有效转化为政绩的同时,还可能因其未知的风险提高地方坏账率,较为落后的地区没意愿也没能力支持这项工程。

四、破除当前困局的可行性路径: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为矛盾之始,亦为破局之终

职业教育在贡献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缺位是由于职教集团无法快速响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而破局的关键就在困境之中。职业教育与新技术融合发展的矛盾,职业教育与产业技术快速迭代的矛盾这两大矛盾是由新质生产力发展直接引起的,而教育内部的结构矛盾客观来讲必然存在,之所以提出,本质上是因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诱发结构性矛盾爆发。因此,新质生产力发展是矛盾之始,同时,职业教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也是破局的关键。针对职业教育与新技术融合发展的矛盾,要厘清职业教育的定位,不能盲目地强调科研任务,而要关注在熟练掌握应用的基础上,提高创新能力。坚持守正创新,以技术是手段,以人为目的,谨防技术理性遮蔽价值理性的现象;针对职业教育与产业技术快速迭代的矛盾,以教材改革和课程改革为主线,加强生产实训为支线,缩小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产业的信息代沟。针对教育内部的结构矛盾,要客观认识到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存在的矛盾,但更要看到两者的重叠。把握两者交汇处便是“有序资本”与“服务型政府”良好合作,互利共赢,克服阻力,真正实现产教融合。

(一) 深化教师数字素养培育与混合式教学模式创新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7 高等教育版》指出高等教育在接纳技术方面展现出的最新趋势是,混合式学习模式的广泛采用和协作学习重要性的日益增长;中期展望中,对学习成效的精确测量愈发受到重视,同时亟须对学习环境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而在长期规划中,则是致力于构建创新的文化氛围,并持续推动深度学习方式的普及与发展。至于在高等教育技术融合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可克服的难题包括提升师生的数字素养以及实现正式与非正式学习资源的有效整合;更为复杂的挑战则聚焦于缩小教育成果的不平等差距,促进数字资源的公平分配;而最为严峻的考验则在于革新陈旧的知识管理模式,并重新定位教师在数字化教育时代中的角色^[23]。以MOOC为例,袁松鹤等对当前有关MOOCs三个典型问题即课程开放、教师开放还是教育开放,行为主义还是关联主义,线上还是线下,进行了深入讨论^[24]。新质生产力时代,职业教育数字化是职业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但这种新技术的进入必然与传统教育产生摩擦,有形无实的盲目数字化不见得是万能的。技术的预设性无疑会影响课堂的自然生成。混合式学习模式的精髓在于两者的互补,而非简单地将内容呈现在显示屏上。

(二) 构建产业协同的教材动态更新机制

创新“教材”供给渠道,突破学校与产业一线新技术的“信息时差”。建立“编外教材”制度,由政府部门统一领导,特聘产业行会专家与高校职业教育领域专家,组成工作室,产业行会专家提供最前沿的产业技术发展情况说明,高校职业教育领域专家负责组织产业技术发展情况并重构为适宜职业教育学生的语言。同时,相关部门开通“绿色通道”,简化审核流程。该成果不以传统教材的书本形式呈现,而以OA期刊论文的形式呈现,绕过传统教材编撰和审核的长流程,突出“短平快”,即流程短、人员架构平、审核快。试点院校的教师可以以此为教材文本,制作相关教学资源及组织教学形式。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和老师传授知识最直接的媒介,以此为主干,加入实训教育以增强实践经验,最终达成理论实践两手抓的目的。但当教材知识比之当下产业技术有较大落后时,就会出现教材“失活”的现象。在新质生产力大发展之前,尽管定制的教材建设落后于产业一线技术,但产业更迭的周期较长,可以容忍教材的相对落后。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产业技术快速迭代,教材“失活”的现象被放大。该期刊的见刊

将弥补职业教育教材的时效性缺失的短板。期刊可以采用月刊制，在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杭州等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发达的地区试点^[25]。此外，在专家的选择上，要处理好专业主导与行业引领关系，在全国范围内精心挑选一支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的高素质专业化专家团队，负责统一编写具有较强意识形态属性的国家规划职业教育教材。这些专家将参与该期刊的审查工作，确保专家组织在职业教育专业教材审查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专家组织将在职业教学专业教材评估中扮演权威和指导性的角色^[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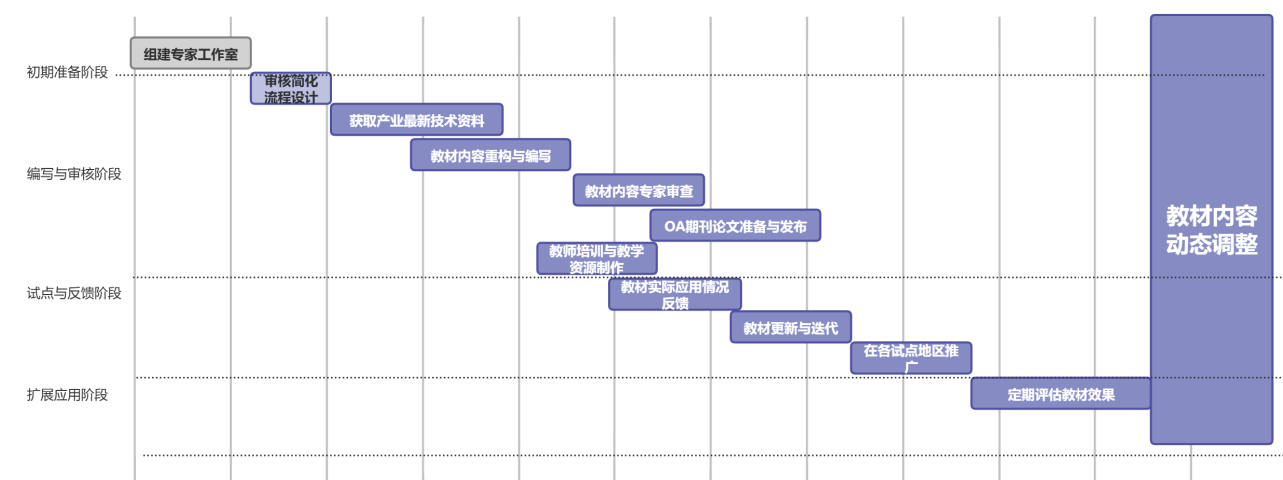


图 4：构建产业协同的教材动态更新机制的甘特图

（三）完善政府市场协同的治理体系创新

在坚持政府部门的监管下，利用市场手段，摆脱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桎梏。首先，应当尽快完善补充当前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搭建更为完整合理的法律制度框架，明确职业教育法律地位，培植一群优秀的职业教育法律从业者，为后续一系列改革构建框架和法律保护^[27]。这将是必要的前期准备及后期应对风险的法律保障。其后，由政府牵头，组织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大的新质生产力企业集团自主选择高校，借鉴钢铁业的成功经验，建立属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长协”机制。长协机制，即长期协议机制，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供需双方就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数量等关键条款达成的长期合作协议。在铁矿石行业，长期合同机制曾是全球铁矿石交易的核心定价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机制经历了显著的转变。铁矿石年度定价的长期合同机制之所以崩溃，主要是由于供需双方力量的不平衡、中国对铁矿石进口资质的管理、需求方内部利益的不一致性，以及钢铁企业对短期需求价格的刚性弹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传统的年度长期合同机制难以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最终导致了其解体。然而，铁矿石领域长协机制解体理由不适用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领域，以年为单位的人才培养时间恰恰符合长协机制的时间单位。长协机制的建立是订单式培养的超越。职业教育订单式教学则更专注于人才培养，特别是与企业的深度合作，通过签订具体的“人才订单”来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确保教育内容和企业需求的紧密结合。而长协机制是以订单式培养为基础，企业深度参与教育和科研过程，实现校企职能耦合互补，在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还能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落实。此外，一旦长协机制成功建立，参与到机制内部的职业院校的竞争力将会得到巨大提高。长协机制不仅意味着校企将展开深度的科技创新和教育研究合作，还意味着该校从某种意义上拥有了稳定的毕业生就业去向。这种明确性和稳定性无疑是当代社会及其吸引学生的特质，院校可以以此为锚点大力宣传，对生源质量进行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式需要以联合体的组织架构运作，即企业可以通过行业联合会的形式向机制内的高校集团发起长协合作，有学者指出校企单线直接合作的“企业订单培养”模式存在

先天的机制缺陷，而由行业协会主导的“行会订单培养”模式则体现出了良好的机制优势^[28]。最后，由国企派出专家组，以完全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建立专门负责人才评价、毕业去向及发展路径监控的咨询公司，这将是职业教育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及人才需求变化的一次大胆探索。咨询公司的建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由企业联合体内的各家公司注资，政府部门以提供大量人才信息为资本，以技术形式入股，仅负责信息安全和监察。由于该公司为轻资产技术与信息密集产业，对企业的负担极小并可能部分替代企业原有的人才评估部门的职能，所以具有非常大的可行性：对政府部门及国企而言，仅以技术入股避免了国有资产的投入，并未涉及“国有资本流失”的红线，因而面对的阻力也会大大减小。这种方案与有些学者提出的引入政府作为第三方不同^[29]，将以专业化市场化的第三方代替政府部门，产教融合的市场化程度和企业参与度都将达到新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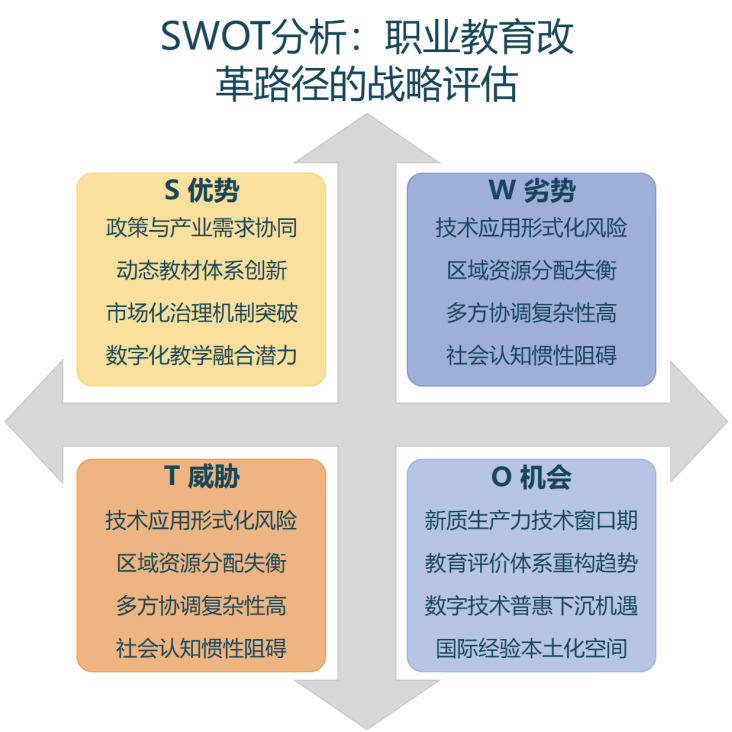


图 5：改革的 SWOT 分析图

结论

本研究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为背景，系统构建了“定位－困境－路径”的三维分析框架。创造性提出职业教育承担着破解中等收入陷阱、构建技能型社会、调节教育内卷的三重历史使命，突破了传统研究将职业教育局限于教育体系内部的认知局限；运用组织学习理论、杜威经验连续性理论等跨学科视角，揭示了产教信息时差、技术理性异化等深层矛盾的形成机理；提出的“编外教材动态供给”“长协机制 2.0”等改革路径，既延续了订单式培养等传统模式的优势，又注入了市场机制与数字技术的新动能。这些理论建构为职业教育适应性改革提供了重要的认知框架，其“动态能力培养”“政市协同治理”等核心概念具有显著的政策启示价值。

尽管研究展现了较强的现实关照，但改革方案的可行性仍面临挑战。就像上文提到的，技术赋能的教育改革存在“数字形式主义”风险。混合式教学模式也可能异化为传统课堂的数字化翻版，AR/VR 等技术工具若缺乏教学法的适应性改造，或将加剧程序化操作与反思性实践的距离。市场逻辑的引入可能诱发新的教育不公平。长协机制与市场化评估体系的建立，或将导致职业教育资源向头部企业、发达地

区进一步集聚,加剧数字鸿沟与区域失衡。再者,制度创新的政治经济学困境尚未破解。教材审批的“绿色通道”可能弱化质量监控体系,而政府技术入股咨询公司的设计,在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下面临合规性质疑。

面对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历史机遇,职业教育改革需在变革与坚守中寻求平衡。当前,数字技术的普惠化趋势与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政策红利,为职业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窗口。唯有坚持守正创新,在破解“技术决定论”迷思中重塑教育本质,在平衡效率与公平张力中创新制度设计,职业教育方能在新质生产力浪潮中实现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的历史跨越。

基金项目

无。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马若虎. 深刻认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点 [EB/OL]. (2024-02-19)[2024-08-24].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40219/73c36872d5e1410a8b6994b1b9ce62b0/c.html>.
- [2] 李华山. 陈劲: 新质生产力对科技创新的新要求 [EB/OL]. (2024 年 06 月 17 日)[2024-08-24].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662/112226.htm>.
- [3] 方晓霞 李晓华. 颠覆性创新、场景驱动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EB/OL]. (2024-05-23)[2024-08-24]. http://gjs.cass.cn/kydt/kydt_kycg/202405/t20240523_5754254.shtml.
- [4] 董一一, 王君萍, 宋宇. 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新进展 [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4, 37(3): 103-117. DOI:10.3969/j.issn.1672-2817.2024.03.009.
- [5] 陈昕, 孔令嫣. 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战略选择 [J]. 北方经贸, 2022(4): 7-10.
- [6] 中央党校经济新常态与发展新理念第八课题组. 经济新常态下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7(1): 36-41.
- [7] 吉喆. 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策略研究——基于系统优化理论的视角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1, 41(9): 31-35.
- [8] Li Z, Lou Y.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Different Concepts of Family Educa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Involution Phenomenon in Chinese Family Education: The Case of the Post-10s and Post-00s [C]//2023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MMET 2023). Atlantis Press, 2023: 514-531.
- [9] 王红, 陈陟. “内卷化”视域下“双减”政策的“破卷”逻辑与路径 [J]. 教育与经济, 2021, 37(6): 38-43, 61. DOI:10.3969/j.issn.1003-4870.2021.06.005.
- [10] 李云星. “漩涡”: 教育内卷生成机制解码——兼论教育内卷的破解之道 [J]. 教育发展研究, 2022, 42(15): 1-9. DOI:10.3969/j.issn.1008-3855.2022.15.003.
- [11] 王明, 杨启光. 理想主义与工具主义的矛盾: 国际文凭组织中的意识形态困境论析 [J]. 外国教育研究, 2023, 50(7): 83-101.
- [12] 余秀兰. 普通教育抑或职业教育: 教育价值观视域下的选择 [J]. 高等教育研究, 2020, 41(1): 68-76.

- [13]王敬杰. 新时代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困境与路径[J]. 职教论坛, 2022, 38(9): 5-12.
- [14]王羽菲, 祁占勇. 职业教育与新技术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 教育与职业, 2020(2): 20-27.
- [15]苗岩. 职业教育的技术嵌入: 原则、异化与校正[J]. 职教论坛, 2019(8): 150-153.
- [16]李天航, 王屹, 唐兴华. 走出“学术漂移”: 技术对职业教育科学研究的规定性[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0(27): 61-66. DOI:10.3969/j.issn.1004-9290.2020.27.009.
- [17]Spöttl, Georg, and Lars Windelband. “The 4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 its impact on vocational skills.”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34.1 (2021): 29-52.
- [18]朱雄才. 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对策[J]. 现代教育管理, 2014(9): 109-112. DOI:10.3969/j.issn.1674-5485.2014.09.022.
- [19]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的逻辑与机制[J]. 职教论坛, 2015(31): 68-68.
- [20]闫广芬, 陈沛酉. 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学的求索[J]. 高等教育研究, 2018, 39(10): 55-62.
- [21]钟艳华. 职业教育管理制度的三大缺失剖析[J]. 职教论坛, 2009(7): 12-15.
- [22]马君, 李姝仪. 企业作为职业教育重要办学主体的制度困境与再造[J]. 职教论坛, 2020(11): 6-13.
- [23]王春娟.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内部治理机制的逻辑起点、架构缺陷及推进路径[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8(32): 44-49.
- [24]王运武, 杨萍. 《2017 地平线报告(高等教育版)》解读与启示——新兴技术重塑高等教育[J]. 中国医学教育技术, 2017, 31(2): 117-123. DOI:10.13566/j.cnki.cmet.cn61-1317/g4.201702001.
- [25]袁松鹤, 马若龙. MOOCs: 开放、争论与启示[J]. 中国电化教育, 2014(1): 69-75. DOI:10.3969/j.issn.1006-9860.2014.01.012.
- [26]李阳, 陈海龙, 田茂再. 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统计测度与时空演变特征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9): 11-17. DOI:10.13546/j.cnki.tjyjc.2024.09.002.
- [27]乞佳, 谷峪. 继承与超越: 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制度建设的经验与取径[J]. 教育科学, 2020, 36(2): 90-96. DOI:10.3969/j.issn.1002-8064.2020.02.014.
- [28]邬雨刚. 高等职业教育“行会订单培养”人才培养机制探析[J]. 教育与职业, 2015(10): 33-35. DOI:10.3969/j.issn.1004-3985.2015.10.009.
- [29]李永锋.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基于联想“订单班”的合作启示[J]. 经济研究导刊, 2018(4): 110-111. DOI:10.3969/j.issn.1673-291X.2018.04.043.